

〔明〕夏完淳 著

白 堅 箋校

夏完淳集箋校

白陞箋校

心集箋校

樸初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夏完淳集箋校

〔明〕夏完淳 著

白 堅 箋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插頁 4 印張 26.5 字數 456,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

ISBN 7-5325-0991-5

---

I·491 定價:8.95元

## 前言

在明、清之際的愛國詩人中，他們的作品能保存迄今並受到後世重視的，夏完淳（一六三一—一六四七）要算是比較幸運的一個。近、現代所輯有關選本，選錄他的詩文的，就我所見，有五十餘種之多；一九五八年以後的諸家中國文學史，都論及其人及詩，有的還把他和其師陳子龍（一六〇八—一六四七）作爲明末詩歌的代表人物。但是，這祇是相對而言，還遠遠不能說，他和他的作品已經得到了應有的重視。當代尚未見夏完淳的評傳和研究專著，還缺乏一本比較完善而易得的夏完淳詩文集，也沒有一本普及性的選集。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夏完淳就引起柳亞子、陳去病、汪辟疆等人的注意和探索，柳亞子在不同時期先後探討和考訂夏完淳生平事迹，闡揚偉烈，取得可喜的成就；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大力表彰夏完淳其人其事，尤其是南冠草一劇在弘揚愛國主義、振奮民族精神、鞭撻漢奸國賊方面，產生重大的影響；近四十年間，也先後有研究成果出現。但總的說來，八九十年的進展是緩慢的。迄今爲止，他的生平的某些重要方面，還未爲人們所熟知和共認，某些不符實際的推斷，甚至被視爲信史和

確論廣泛流傳；他的作品，也有待深入探討。

筆者乘夏完淳集箋校竣事之際，謹就歷年所知所見所得，對其人其事其文的犖犖大端，試加論列，以就正於海內外學人，並希望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把夏完淳及其作品的研究推進一步。

一

夏完淳，原名復，乳名端哥，號存古，別號小隱，又號靈首，曾輯早年詩文爲玉樊堂集，入又以玉樊相稱。崇禎四年（一六三一），生於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今爲上海市松江縣）的一個仕宦人家。

高祖夏鳳，字心隱，本生高祖夏鸞，字少隱。曾祖夏簡，字奇雲。祖父夏時正（一五六〇—一六二七），字行之，號方餘，平日讀書有得，然久困省試，刻意爲古文詞詩歌，有回春齋詩稿。祖母顧氏（？—一六四二），以識見過人，教子以正見稱。父親夏允彝（一五九六—一六四五），字彝仲，號環公。崇禎十年進士。任福建長樂知縣。舉「天下廉卓第一」。嫡母盛氏（一六〇四—？），甚鍾愛完淳，「推乾就溼，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生母陸

氏（一六一三—？）<sup>〔六〕</sup>，生平不詳。姊夏淑吉（一六一八—一六六一），字美南，號荆隱，改號龍隱，「通大義，工詞賦」<sup>〔七〕</sup>。妹夏惠吉，字召南，號蘭隱，能詩。

夏允彝是幾社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文章道德，負士林重望。所交多賢士，又好援引後進的才智之士。所以，完淳自幼年就有機會和四方賢士接觸，和許多前輩及年事較長者相交往。而且，允彝很注意為兒子選擇良師，如張溥（一六〇二—一六四一）、陳子龍、曹度、沈楫、計南陽、周茂源<sup>〔八〕</sup>等人，皆一時敦品積學之士，張、陳更是衆望所歸的人物。完淳奉以為師的，還有文武兼資的吳易（一六一二—一六四六）<sup>〔九〕</sup>。不但如此，允彝至北京謁選，赴福建任職，均隨帶完淳同行，讓他接觸社會，增加閱歷。

完淳幼年，明朝已處於腐朽糜爛、百孔千瘡、不可收拾的局面。農民起義軍正以燎原之勢迅速發展，後金（清）在關外着着進逼，並連續以重兵入塞，進行大規模的掠奪。一個天崩地裂、社會激烈動蕩的時代已經開始。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完淳十四歲，李自成農民軍自大同、宣府直搗北京，崇禎帝朱由檢自縊，吳三桂乞師於清，清兵乘機入關，迅速進入北京。次年，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清兵南下，陷揚州，南京不戰而降，弘光帝朱由松出走被俘，江南淪亡。由於時勢的急劇變化，民族矛盾代替階級矛盾而居於主要地位，十五歲的完淳，走上禦

侮圖存、抗清復國的道路。

完淳五歲講論語，六歲熟經史，能詩文，時人許爲「神童」，錢默特爲作神童賦。無疑，他具有較好的秉賦，較好的姿質，但他之所以迅速成長，起主要作用的，除他自己見善則遷，努力不懈外，還是上文所述家世、家庭、環境、教育、交遊、閱歷、社會、時代諸因素，而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則爲明、清之際這個大動蕩的時代。

## 二

完淳十五從軍，十七殉國，他生平最主要的活動，集中於這兩三年中間，確切點說，不過兩年多的時間。這裏，不作過程的縷述，只就從軍、下獄、就義方面的幾個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其一，完淳初次從軍，參與製訂恢復江南的大計。

清兵渡江以後，以南京爲大本營，以蘇州、杭州和海濱的吳淞等地爲據點。清兵的屠殺、劫掠和強迫雜髮，逼使江南人民奮起抵抗，各地義師一時並起，許多文官、武將、縉紳、在籍官員和愛國志士被推爲義師領導。允彝帶着唯一的愛子完淳，挺身而出，奔赴抗清第一線，入

明吳淞總兵吳志葵軍中，由吳淞江直撲蘇州城下。楊鳳苞南疆逸史跋云：

雲間夏吏部瑗公，出一奇計：令一軍據蘇州以斷首尾，一軍破杭城，聯絡越中六家軍，一軍殲沿海之列戍者，一軍直搗金陵，飛檄九江，以窺豫章，復伺餘兵勢窮，渡江而北，半濟而擊之，剋期同發……往余借書於董上舍傳細梅閣，得施世傑西戎雜記，中載義士之籌畫，如瑗公者，尚有五六人。

南疆逸史死事傳有類似記載，但未言出處，所以，楊氏特爲點明。當時人宋轅文的東村記事雲間兵事則云：

有孝廉徐孚遠者，年五十矣，好奇計，敢爲大言，素與子龍善，諸生張密者，故嘗佐何剛練水師，好言兵，子龍內弟也。兩人日夜以義聲說子龍曰：「我聞北兵且有變，大兵必歸，江左舉義者所在而有，公不先，居人後矣。且諸舉義者固日夜望公。」子龍聞之心動，往謀於允彝。允彝曰：「是不可爲也，而義不可已也。」姑聽之。孚遠輩聞之大喜，即部署諸喜事少年，得數百人，起兵有日矣。

宋徵輿（一六一八—一六六七），字轅文，松江華亭人。在幾社中有聲。與允彝、子龍相往來。他在南都崩潰後，即應清試中舉，於順治四年成進士，報效新朝，完淳有毘陵遇轅文一詩譏之。其所記義師緣起，雖不免貶抑、避諱，事當有據。今西戎雜記尚未得見，從東村記事可知，當時參與籌畫者，當即陳子龍、徐孚遠、張密等，皆幾社中人也。



從歷史背景和當事人記述來看，允彝爲首製訂這一奇計，是否可信呢？柳亞子江左少年夏完淳傳謂，此計「由允彝和完淳父子倆草定」，又是否可信呢？

根據當時形勢，由允彝爲首製定大計，是合情合理、完全可信的。吳志葵是允彝門生，其進軍蘇州，乃允彝發書招之<sup>(一)</sup>，自須有個使之信服和聽從的規畫；允彝在吳軍中飛書草檄，聯絡四方<sup>(二)</sup>，也必得有個足資號召、共策進行的方案。這是一。允彝「學務經世，志常在天下」<sup>(三)</sup>，熟悉山川形勢和軍事方略，爲東南人士所推重，即使出謀共議者尚有數人，也須經允彝抉擇、審定而後行。這是二。允彝等當事者和他們周圍的人，事後絕口不提此事，乃出於當時處境，有意隱諱，儘管如此，允彝本人自沈前所說「舉事一不當，而遽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sup>(四)</sup>，「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我何以謝諸公」<sup>(五)</sup>，仍然透露出他的主謀者的身份。這是三。完淳二哀詩頌錢塘漢石有「此日義師收建業，九京消息更何如」之句，即指這一恢復大計而言。這是四。

那末，完淳是否參與製定呢？我們還是從有關材料作綜合考察。允彝平素「好獎勵後進，有片善，稱之不容口」<sup>(六)</sup>，對子女也不例外。弘光時，允彝母喪終制而不就考功主事職，就出於女兒淑吉的建議。這是一。和允彝共同籌畫的陳子龍和徐孚遠，對完淳都很熟諳，且

特加贊賞。完淳十二歲時就對客「抵掌談烽警及九邊情形，娓娓可聽」，「談軍國事，鑿鑿奇中」(一)。在允彝等共商大計時，完淳附於末座，陳述己見，是勢所必然的。這是二。允彝在動亂之際帶完淳出入軍中這一非常舉措，顯然意在發揮兒子的聰明才智，爲國效力。交流共商之後，由允彝執筆草定恢復大計，而完淳朝夕相從，自必多所貢獻。所以，強調此計由允彝、完淳草定，也未爲不可。這是三。歸結起來，我們認爲，完淳參與製訂恢復江南的大計，是有根據的，合情合理的。

其二，完淳再次從軍，在吳易軍中受禮遇，居賓幕，參與海鹽之役。

清兵渡江後，吳易與孫兆奎舉義最早，克復吳江，擒殺清朝縣令，並大敗來犯清兵於長白蕩。後大雨兵敗，孫兆奎被獲就義，吳易泗水得脫。約當歲暮年初，吳易收集潰散，重整旗鼓。隆武二年丙戌（一六四六）正月十五日，再破吳江，三月二十三日，大敗清兵於分湖(二)。完淳「遵父遺命，盡以家產餉軍」，入吳易軍爲參謀(三)，當在吳江、分湖兩役之間。四月初，完淳隨軍參加攻克海鹽的戰役。武塘野史說他在海鹽被圍，吳軍退走時「被執，送至南京，死之」(四)，顯然出於誤傳。據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記(稿本)，丙戌五月十四日，「得夏存古信，知初二日曹溪又遭掃蕩，存古墮水僅全」；十六日，又有「存古飄搖無所」的記載。可見海鹽之役以

後，完淳至遲在四、五月之交返回松江曹溪寓所。

完淳集中的軍宴、訪友不遇、魚服、同友人過東道院、鶉衣、軍中有作等都作於吳易軍中。軍宴有「自愧青藜陪客座，幸從細柳識軍威」，「我已破家酬大鎮，相逢斜拂劍霜看」之句，魚服有「投筆新從定遠侯」之句，當作於入幕之初。同友人過東道院有「軍中高宴逐輕車」句，鶉衣有「歌舞軍中聽轉哀」句，乃屯兵湖中的閒暇所作。吳易於六月初九日在嘉善中計被捕，幾日後在杭州被害，六月二十五日，完淳在嘉定槎溪侯氏別業獲知噩耗。即事第三首，有「將星沈左輔，卿月隱中臺。東閣塵賓幕，西征愧賦才」之句，當即聞耗之際的愴痛之作。吳易骸骨未歸，完淳和同心密友一起擇地爲他建立衣冠塚，以資紀念，後來吳江野哭所云「相將灑淚銜黄土，築公虛塚青松路」，即追憶此事而言。數月後的風雪之夜，更作哭吳都督六首（三），痛哭盡哀。

這次從軍生活，是完淳一生的重要階段。完淳毀家餉軍，滿懷壯志豪情，受到將士的歡迎和尊重。更重要的是，吳易是一位非常人物，他很賞識完淳，視爲國士，處以賓幕；完淳也很崇敬他，奉以爲師，並從他身上接受了深刻的影響，他們之間，結成了非同尋常的師生之誼、戰友之情。這些，在完淳的哭吳都督六首中表現得很真切動人，舉其一首如次：

知已功名盡，傷心叩九閭。餘光留日月，遺恨滿乾坤。湖海門生誼，荆榛國士恩。滔滔江水闊，萬里獨招魂。

其三，完淳被捕下獄，是由於謝堯文通海事洩。永曆元年丁亥（一六四七）夏間，完淳在家鄉松江被捕，解往南京，於同年九月十九日與顧咸正、劉曙等四十三人同時遇難。這批殉國烈士的下獄之由，歷來有謝堯文通海案和吳勝兆反正案二說。就完淳言，有主前一說的，有持後一說的，也有兼取二說加以貫通的。原來謝堯文齋疏表通海是在吳勝兆反正失敗後才進行追查的，吳勝兆圖謀反正曾與舟山黃斌卿聯繫，也具有通海的性質，況且兩案在獄的人同日在南京遇難，更使兩案牽扯在一起，難予分清。

好在清朝的檔案還在，我們輾轉查到清方處理這兩案的幾份正式文件，加以考核和驗證，問題就豁然而解了。其中最重要的是：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八月二十二日刑部尚書吳達海題本和九月二十四日江南總督洪承疇題本（三）兩件，是處理謝堯文通海案的，以「通海寇」為外援，結湖柳為內應，祕具條陳奏疏，列薦文武官銜為詞，「依謀叛律」於九月十九日「會官處決」顧咸正、夏完淳、欽浩、吳鴻、謝堯文、劉曙等三十三人，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日和九月二十四日江南總督洪承疇揭帖（三）兩件，是處理吳勝兆反正案的，此案牽連的有吳勝、錢彥淋、徐

似子（白壁案，當是錢彥林、徐似之之誤，錢名栴，徐名爾毅）、夏保謨、張名斌等十人，於九月十九日「會官梟斬」。兩案同日共「處決」四十三人，和各家史籍所記遇難人數恰合。如自靖錄考略所謂「惜未盡知同難四千三十三人之姓名，以告讀者，庶幾播芳馨而彰正氣，著偉烈以慰英靈。」註中逐行列舉四十三位烈士之姓名，以告讀者，庶幾播芳馨而彰正氣，著偉烈以慰英靈。

完淳下獄由於通海事洩，於是可以論定了。有些史籍述及完淳參與謀畫吳勝兆反正事，甚至說成主謀之說。關於此點，清內閣檔案全未涉及，我們也未發現他與謀或主謀的確鑿事實和佐證。從完淳細林野哭中「彷彿聊城矢更飛」句，可見他知曉陳子龍對此事的謀畫，而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記丁亥四月初二日，即有夏淑吉轉述完淳信中所云松江「尅日奇舉」的記載，可證在吳勝兆舉事前半月左右，完淳確已聞知此事（且日記還多次述及此事先已洩露，如「遠近喧傳，吳督即日反正」，非僅「耳語」，已成「街談」云云）。至於說吳勝兆使人通過完淳以達於陳子龍，完淳為吳勝兆草檄等等，皆傳聞不足為據。完淳被捕下獄，並非由於反正事敗所牽連，則無可置疑。

其四，完淳和岳父錢梅（一五九八—一六四七），同在南京獄中，同樣慷慨吟詩，從容赴義，難翁難婿，並美交輝。

完淳在被逮後的幾十天當中，吟詠不輟，高歌慷慨如平日，留下了輝耀千秋的南冠草和獄中草。他在臨訊時機智從容地痛罵洪承疇的情景，更受到當時和後世的熱烈稱道。

錢梅，字彥林，嘉善人。爲江南文社創始人之一。「性豪俠，善待士」，亦多智略，傾動一時。弘光時，任兵部職方主事，郎中，奉勅視江、浙城守，輯成並刊行城守籌略一書，自序以「光復燕、秦，逾晉轡宋」爲心。南都潰後，起兵謀恢復，失敗後，欲奔赴浙東而未果。下獄後，吟詠頗多，今尚存十三首，足以窺見他當時慷慨嘯傲的豪情，舉其中與同難侯其偉美漢一首如次：

何須相聚再攢眉，三載偷生死已遲。祇爲忠貞常自盡，豈真成敗不前知！九重有子當隨侍，千古無予覺未宜。同難幸多名節裔，且借笑語莫淒其！〔三〕

自靖錄考略特爲記錄了他們翁壻臨難時的對話：

完淳甫十七歲，臨刑意氣從容，一如平時。梅願語曰：「子年少，何爲亦死？」完淳笑曰：「寧爲袁象死，不作褚淵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爭先就義。

顯然，錢梅是從容赴義的，祇不過對愛壻稍有顧惜。完淳怪他相期太薄，以和他同死爲榮，可見婦翁在青年詩人心目中居於崇高的地位。

據有關史籍記載，錢梅被逮，由於追索陳子龍，疑其藏匿故，子龍既獲，業已釋疑，清吏卻不肯罷休，強加以罪而置之死地〔三〕。此點早經史學家指出，而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日江南總督洪承疇揭帖的發現，更提供了一份深文周內，強加以罪的鐵證。這份揭帖是報批吳勝兆一案的專文，冗長達數千言，其中強指錢梅（還有徐爾毅、夏保謨）同謀，卻提不出一項情節，舉不出一件證據，所謂「若陳子龍叛形彰著」，錢梅等「不即拒絕，乃事前商榷，事後探望」，「謂非同謀，其誰信之」，所謂「陳子龍素日以鄉紳負虛名，到處招搖，逢人聯絡」，錢梅等「即有夙交，亦當拒絕，以各保身命，乃爲之往來看望，促膝歡洽，其助逆之意，早已深爲許可，迨事敗之後，欲自辨其不同謀，將誰欺乎」，其蓄意附會、詭詞羅織之迹甚明。錢梅據理申辯，乃情理所當然，客觀上更有揭露冤酷的積極意義。有些史家未詳本末，輕信傳聞，遽謂錢梅「未免乞哀」，「有乞生意」，「氣稍不振」〔四〕，如此論斷，從此案實際看，顯然不恰當、不公正。而且，此類說法，與錢梅獄中詩作相悖，與其生平表現未合，且與其身後輿評扞格。郭沫若的歷史人物夏完淳一文述及錢梅，認爲「他的死難」是「受了他女婿的感化」，又說他在被審訊的時候，「有洩氣的地方」，「受了完淳的一番激烈，算得以同時死難，全了晚節」，就是根據此類說法立論的。更有甚者，他在南冠草一劇中用錢梅襯托完淳，經過想像、發揮，把錢梅塑造造成原先是悲觀消極

的動搖者。臨難是萎靡不振的怯懦者，使烈士受謗蒙冤。所以，筆者特地根據所見資料，爲錢梅說些公道話，希望有助於遷錢梅以歷史本來面目。

### 三

評價封建時代的人物，往往牽涉到對封建帝王的態度問題。對士大夫來說，忠君和愛國往往交織而不可分。尤其是民族、國家處於危難時期，忠君、勤王往往成爲號召遠近共赴國難的手段，志士、愛國者往往把忠君作爲表現愛國思想、從事愛國活動的形式。許多愛國詩人是在這種情況下湧現出來的。夏完淳便是晚明時期傑出的一員。

在完淳的作品中，忠君思想是貫徹始終的。他自矢：「功名不可成，忠義敢自廢！」他慨歎：「未申歸國意，徒有報君心。」他嚮往隆武帝所在的福州：「第一樓爲龍虎關，內三山作鳳凰城。」下獄以後，他表白至死仍然爲朱明王朝效忠：「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被鞫之時，望見孝陵，他激動地高唱：「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暉。」在這裏，既可看到作爲封建倫理道德的支柱的忠君觀點，又可認爲在忠君的名義下含蘊着愛國思想，體現了民族氣節。和忠君相聯繫，或以忠君爲表現形式，這是所有封建時代愛國者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對他們橫加指



責，或者要求他們沒有忠君思想，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曾見有詩歌選本選錄夏完淳的《長歌一詩》，對其中「美人何在青雲端」的「美人」，不是指明喻南明君王，而是含糊認為喻高尚理想。這種故為隱諱的做法，是不必要、不足取的。

完淳的愛國思想並不都表現為忠君的形式。在他的作品中，有對於昏庸誤國的弘光帝的譏刺和譴責：「君王銜璧出轅門，落日悲風滿姑孰。……殿前匍匐三頓首，明駝快馬追風走。」有對於擄掠暴行的揭露：「漢宮佳麗抱琵琶，皓齒紅顏塞上沙。」有對於燒殺暴行的控訴：「到今羅綺古揚州，不辨秦灰十二樓。」有對於其他暴行的譴責：「胥徒相望於道，銀鑪不絕於途」，「徵求不已，零索無窮」。這些，和當時人民羣衆的愛憎，正相一致。由此可見他根本不問於那些囿於封建傳統觀點的不計所忠者為何等人君的愚忠者。他的愛國，既是對屈原來愛國主義的優秀傳統的繼承，又具有時代的新內容，和當時人民羣衆的愛國，有着共同和一致之處。

在抗清鬪爭當中，完淳接觸人民羣衆，很贊賞勞動者的那種「竿木羣興」的抗暴意志，願意「結屠簫之豪客」，共同戰鬪。在遇盜自解一詩中，對於不與清人合作逃遁於山林的豪士，表示熱烈同情，寫下「綠林滿地知豪客，寶劍窮途贈故人」之句。